古代如何防控家族势力腐败

打开二十四史,家族腐败史不绝于书。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视为家族式腐败的一个最为通俗的注解。当然,有权力必然会引起贪腐的欲望,那么古代有哪些方法控制家族权力呢?

家族式腐败有两种情形,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形成贪官家族;一是有些腐败家族不只贪财,还企图控制政权甚至取而代之。为了做好有效防控,保卫帝王这一小家,针对不同类型的家族势力,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和制度。

外戚之家 “祖宗成规”制之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祖宗成规”成为制约外戚的重要法宝。东汉时,“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宋代为皇帝选皇后,特意“选于衰旧之门,庶免他日或挠圣政”。

所以,宋代“女子之防尤严”,不允许后妃预政。个别得宠后妃,恃宠干政,皇帝一旦发现,也予以严裁。这些“故事”,被固化为“祖宗遗训”,深入人心,转化为朝野人士的共识和自觉,是对后妃势力的最有力的制裁。

宋代重文轻武,外戚“不得任文资”,就不可能占据要职,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势力。但也有先为高官而后联姻而成外戚者,则可任文官,但一不许任侍从官,二不许任二府要职。

宋代凡带殿阁待制以上职名,皆为侍从官。因此,宋代外戚受到很好的抑制,没有形成势力集团。把持朝廷、弄权舞弊的只有外戚韩侂胄和贾似道,且都出现在南宋后期朝纲混乱之际。

但是,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外戚就会成为心腹之患,如到了清代,雍正历数外戚年羹尧种种罪状共九十二款,款款都直指权力家族化与腐败,都“当大辟,亲属缘坐”。

士大夫家族 科举上抑制“官二代”

士大夫家族一旦拥有权势,便成为家族腐败的源头,或者说,家族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变种或形式,而且单个人腐败一旦上升到家族腐败,往往便形成政治权力斗争。

因此,家族腐败威胁政权。最低层次上容易引发党争,任人唯亲,是政坛上的毒瘤,因此,历代帝王都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

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科举上抑制官二代。科举在长达1300多年历史上为寒门士子晋身参政提供了机会,但各个时期都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这实际上剥夺了很多寒门子弟的政治权利。

因此不少帝王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唐代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宋代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

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

清朝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同时,不少帝王对于官员子弟参与科举舞弊也会严惩。

据《党政朝野》

吴三桂秘密武器 二百年后所向披靡

太平军自广西北上,攻占湖南岳州之后,偶然发现了一处宝藏。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回忆说“破岳州得吴三桂之器械,搬运下舟,直下湖北”。这笔宝藏就是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进军湖南埋藏起来的枪炮,在地下埋了两百年,挖出来竟然还能用,帮助太平军攻打武昌,算是为吴三桂报了一箭之仇。

吴三桂的火器,质量竟然这么好?这些火器估计都是他当明朝山海关总兵时候开始装备的。崇祯15年4月,崇祯曾亲自发下手谕,指示范志完将宁远、前屯、中前、中后这四城原存贮的粮食,以2/3给三桂,如三桂招募新兵,即准按户给食。钱粮已足,吴三桂等又请示盔甲、弓箭、枪炮等军需。

而吴三桂的敌人康熙,似乎也见识过这种火器的威力,对之心有余悸。平定三藩之后,便逐渐将火器的制造作为国家秘密,反而告诫臣工:“我国家用兵以来,所向无敌,野战则尽歼,攻城则必克,惟以弓矢戈矛摧坚破墙,无有不胜。”这种观点其实是有意无意地篡改历史。满清入关,除了“弓矢戈矛”,更多的是依靠缴获的“红衣大炮”。康熙的谎话,雍正嘴上信,心里不信,派年羹尧平定青海,照样是广造火器。到了乾隆就不行了,乾隆是真相信,他设火器营于京师,规定“京师而外,不得用火器”,如果四方有寇,就从京师送火器过去,事平仍归京师。这样一来,火器就彻底成了皇帝的禁卫军才有的装备,地方绿营仅仅装备点鸟枪之类作为点缀。乾隆年间,英国使团好奇地问地方官员“为何城堡上没有一门大炮呢?”地方官员笑了笑,说它们没有用,因为中国的敌人也不拥有这玩意。壁垒仅仅是为使皇帝的财宝和粮仓免遭强盗抢劫用的。

于是,吴三桂的火器,竟然在二百年后诡异地成为战斗力超强的秘密武器,所向披靡。

据《学习时报》

想中进士要背书40万字

“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一诗写出了自己中进士后的得意之情。那么,在我国古代,要想中进士,要背多少书、考多少试呢?

清朝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考试共分10个阶段进行。前4次为学校考试:县试、府试、院试(即秀才考试)、岁试;后6次才是正式的科举考试:科试、乡试(即举人考试)、举人复试、会试、会试复试、殿试(及第者称进士,其中第一名为状元)。

在这一连串的考试之前,书生要背诵多少书呢?据程曦《中国历史轶闻》一书统计:《论语》:11705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合计407179字。这40多万字全都要精读背熟。

此外,更要看是原作几倍数量的注释,还有其他非读不可的典籍、史书、文学书籍等等。

可见,状元并不是摆设,没有真才实学,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难怪有不少书生,考试考到了70岁,还未考上。也难怪孟郊中进士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了,也难怪《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在中举之后,高兴得发了疯。

据《报刊文摘》

印军俘虏感慨中国军民友善

中印军人在边境线上

1962年10月19日深夜,印军通信中校提瓦力随第7旅旅部进驻南卡楚河畔的桑格哈尔,憧憬着明天冲上塔格拉山主峰。然而,20日凌晨中国军队开始反击了,提瓦力和第7旅旅长达尔维被俘。中国军人对他们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敌意,当印军解除武装后,他们主动生起火堆,让俘虏们取暖,还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进行掩埋,插上标记。

惊讶于中国的官兵平等

10月26日,提瓦力被安顿到位于西藏中部的琼结县收容所。提瓦力回忆,当时中国为印俘准备的登记表都是中英文对照,因为中方强调所有项目都要符合《日内瓦公约》规定。和提瓦力打交道最多的是一名姓佟(音)的解放军中校。佟中校很诚恳地向提瓦力请教关于印度官兵的军衔职称以及姓名方面的问题。

最让提瓦力等印俘军官动容的是,中国军队的官兵平等原则,因为,印度军官都配有勤务兵,视体力劳动为下贱的事。一次,印俘中队随中国干部去山谷拾柴,印度士兵看见中方中队长拿着绳子走在后面,纷纷猜测:“中国长官拿着绳子跟上来,如果谁不好好干活,一定会被捆起来。”但他们后来发现,中队长自己也在拾柴,那根绳子是背柴火用的,印俘们这才恍然大悟地说:“中国军队与印度军队真是大不相同。”

回国前受邀参观中国内地

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早在3月26日,印俘们就得到通知,他们不久将被释放。为了满足印俘军官提出的希望参观中国内地的愿望,中方宣布全部校级以上印俘经内地遣返。这样,尽管提瓦力等人的身份还是战俘,但已经不被看做敌人了。中方为每个人量身订作了西服和皮鞋,并准备了个人用品。

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印俘达尔维准将、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他们在北京观看了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和焰火,还同印度驻华使馆人员见了面。中方接待人员很有分寸,他们称印度被俘军官为“先生”,和他们讲话时称“印度朋友”,从不用伤害他们自尊心的言语。一名印俘中校说:“旅行期间,我们看不到中国有反印漫画和标语,人们的言行中也没有丝毫敌意,这和我们从前听说的大不相同。”

据《环球时报》

盘点

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商鞅变法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变法运动,著名的有四次变法,分别是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变法、王安石变法还有戊戌变法。

商鞅变法

严刑峻法,成就强秦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第一次是在孝公六年: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级的制度;采用李悝《法经》作为法律,推行连坐法。第二次是在孝公十二年: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一说四十一县);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倍征服;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

北魏孝文帝变法

胡汉一家,盛世肇基

北魏孝文帝即位时,在中国北方民族融合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他顺应历史潮流,主动采取改革措施,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孝文帝的改革是分两期进行的。第一期开始于公元484年,主要改革政治经济制度,措施主要是政治上整顿吏治,实施俸禄制度,严惩贪赃枉法;经济上实行均田制、三长制、户调制,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完善农村基层政权,保障国家税源。

王安石变法

不畏人言,金陵梦碎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

戊戌变法

百日维新,壮志难酬

1895年,康有为偕梁启超在京赶考之际,获悉甲午战败,乃串联千余举人“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仍未上达。同年,康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后仍屡次上书呼吁变法,率门生同志创办《万国公报》、《时务报》和强学会、保国会。影响所及,各地骤然兴起办报刊、学会、学堂、书局热潮。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史称“维新变法”,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据《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